

# Alejandro Zambra

Formas de volver a casa



回家，就像是离开一场尚未结束的战争。——亚历杭德罗·桑布拉

## 回家的路

〔智利〕亚历杭德罗·桑布拉 著  
童亚星 译



# Alejandro Zambra

Formas de volver a casa

## 回家的路

〔智利〕亚历杭德罗·桑布拉 著  
童亚星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家的路/(智)桑布拉著;童亚星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外国中篇小说经典)  
ISBN 978-7-5321-4993-3

I. ①回… II. ①桑… ②童… III. ①中篇小说-智  
利-现代 IV. ①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6639 号

Alejandro Zambra

**Formas de volver a casa**

Copyright © Alejandro Zambra 201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Spanish by Editorial Anagrama S. A. in 2011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3-409

总策划:黄育海 陈征

出版统筹:陈丰

策划编辑:任战

责任编辑:韩樱

封面设计:董红红

## 回家的路

〔智〕亚历杭德罗·桑布拉 著

童亚星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e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4.5 字数 83,000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993-1 · 3922 定价:20.00 元

*Novella*  
•————— 7  
中经典

# 中篇小说的“合法性”

## ——“中经典”总序

毕飞宇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 Long short story 勉强算一个，可是，顾名思义，Long short story 的着眼点依然是短篇，所谓的中篇小说，只不过比短篇小说长一些，是加长版的或

加强版的短篇。

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 Novus 这个单词无法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 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 Novella、德语里的 Novelle 和英语单词 Novel 都是从 Novus 那里挪移过来的。——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一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四，也是男人，绝不是“中篇男人”。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小说家需要对西方的文学传统负责任么？不需要。这个回答既可以理直气壮，也可以心平气和。

我第一次接触“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是在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发育并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

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没有一个国家的中篇小说比中国新时期的中篇小说更繁荣、成气候，这句话我敢说。嗨，谁不敢说呢。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当然，我绝不会说西方的中篇小说不行，这样大胆的话我可不敢说。虽然没有明确的“中篇”概念，他们的“长短篇”或“短长篇”却是佳作迭出的。我至今记得一九八三年的秋天：《老人与海》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献给安德里亚

我已学会行走，从此再无力学习。  
——沃尔特·本雅明

我没有呐喊，而是写作。  
——罗曼·加里

目录

I. 配角 .001
II. 父辈的故事 .029
III. 晚辈的故事 .061
IV. 我们都好 .101
译后记 .123

## I. 配角



我六七岁的时候走丢过一次。当时我迷迷糊糊，一下子见不着父母的影儿了。一阵害怕之后，我马上重新出发，赶在父母之前就到了家——那时他们还在绝望地找我。其实那天下午我倒是觉得，走丢的是他们。毕竟，我可知道自己回家，而他们却没有。

“你走岔道了。”后来母亲对我说，眼里还挂着泪。

“明明是你们走了另一条路啊！”我想着，但没吱声。

父亲在扶手椅上静静地看着。偶尔我觉得他一直躺在那里沉思，但他恐怕什么都没想，可能就是闭上双眼，逆来顺受地接受眼前的一切。不过那天晚上他开口了：“这挺好，”他对我说，“你战胜了困境。”母亲用疑虑的眼光盯着他，可他还是自顾自地发表了一番关于“困境”的杂乱无章的言论。

我缩在父亲对面的沙发上，假装睡着，听着他俩老掉牙的争吵。母亲说上好几句话，父亲只给出一两个字的回应——偶尔斩钉截铁地冒出一个：“不！”偶尔在母亲的咆哮之余插上一句：“扯淡！”还有些时候，甚至会像警官一样命令：“闭嘴！”

那晚，母亲抱我上床，她可能知道我只是装睡，其实却好奇地听着她的一举一动。她说：“你爸爸说得有理。现在我们知道了，你丢了，知道你能一个人上街了。但你在路上该专心点儿，该走得更快些。”

我把这话放心上了。从那时起，我加快了脚步。事实上，好几年之后，当我第一次跟珂罗蒂雅聊天时，她还问

我为什么总走那么快。当时她已经跟踪我好几天了。我们是在那次聊天前不久才认识的：一九八五年三月三日，大地震<sup>①</sup>当晚，不过当时我们并没说上话。

那时珂罗蒂雅十二岁，我九岁，所以我们的友情实在是不可思议。不过我们看上去倒挺像朋友，常常聊天。有时我会觉得，我写这本书，无非是为了追忆那些谈话。

地震那晚我很惊恐，但从某个角度说来，我也挺喜欢那晚发生的事。

大人们在一家屋子的院里搭起两顶帐篷，让我们这些小孩儿睡觉。这事儿一开始就惹出了乱子，因为所有小孩儿都争着要睡在爱斯基摩风格的那顶帐篷里，那东西在当时可是个新鲜玩意儿。最后，大人们把它分给了女孩儿们。我们这群男孩儿把自己关在帐篷里悄声打闹。大人不在时，这是我们的保留节目：兴高采烈、毫无节制地追来打去。不过那次，红发小子很快就被打出鼻血，我们只得另找法子娱乐。

不知谁想到了立遗嘱的点子，乍一听我们觉得不错，但随即发现这事儿毫无意义。因为如果再来次更强烈的地震，估计全世界都能被毁掉，那我们的财产自然无人继承了。于是我们又想象着地球就像一只猎猎打颤的狗，人们

---

① 智利是地震多发国家，一九八五年圣地亚哥大地震震级为八级，死亡一百七十余人。

就跟它身上的跳蚤似的纷纷掉落太空。反复想象这样的场景乐坏了我们，也让大家渐生睡意。

可我不想睡。其实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但这种全新的疲惫让我两眼放光。我决定熬通宵，还打算混进那顶爱斯基摩帐篷里，好跟女孩儿们接着聊聊。没想到警察的女儿却一口咬定我想强奸她们。虽然那时我还不大懂得强奸犯是什么意思，但还是立马保证我没想过要干这事儿，只是过来瞧瞧而已。那女孩儿嘲讽地一笑，说，天下强奸犯都是这套说辞。于是我被关在帐篷外，听她们玩游戏。她们假装那些洋娃娃是地震后仅有的幸存者，看到主人去世，娃娃们抚尸痛哭。只有一个娃娃觉得这样才大快人心，因为对它而言，人类这物种臭味十足。游戏最后演变成一场争权夺利的比拼，看上去姑娘们似乎要吵个没完，结果却很快达成一致——所有的洋娃娃中只有一个正版芭比。她大获全胜。

我在废墟中找到一把沙滩椅，胆怯地靠近大人们的篝火。看到邻居们大概是头一次这样聚在一起，我还真不习惯。他们小口小口地抿着酒，排遣恐惧，悠长的目光中满是同命相怜的味道。有人弄来一张旧木桌丢进火堆，好像那桌子一文不值似的。“要是你乐意，我把吉他也扔进去。”父亲这样对我说。所有人都笑了，我也笑了，笑得有些迷惑，因为父亲很少开玩笑。这时，邻居劳尔带着玛卡丽和珂罗蒂雅回来了。“她们是我姐姐和外甥女。”他向大家介绍。地震发生后，劳尔曾四处寻找她们，现在终于把人带回来了，他显然是松了一口气。

劳尔是村里唯一独居的人。我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能独自生活。在我看来，独居是对一个人的惩罚，或是病态的象征。

那个早上，当劳尔开着顶棚上绑着床垫的菲亚特 500 型轿车来到村里时，我问母亲他的家人什么时候来。母亲温柔地回答我，不是所有人都有家人。这话让我觉得我们有义务帮助他，可我很快惊讶地发现，父母都没这想法，他们认为没必要，甚至还对这个瘦削安静的男人心怀戒备。我们是一墙之隔的邻居，还共享一段女贞花墙，但却被一道巨大的鸿沟隔断。

村里传言说劳尔是基督教民主党<sup>①</sup>人，这让我觉得挺有意思。现在看来，还真说不清为什么一个九岁的孩子会觉得某人是基督教民主党人是件有意思的事。可能当时的我认定这和他凄凉的独居大有关系吧。我从没见过父亲和劳尔说话，所以地震那晚，当我看到他们一起抽烟时，我颇为震惊。我猜他们在谈论“孤独”，父亲会给这位邻居提上点儿战胜孤独的建议，虽然事实上他自己对这个话题也知之甚少。

另一边，玛卡丽在远离人堆的角落里抱着珂罗蒂雅。她们看上去不大自在。出于礼貌，但也可能别有用心，一位邻居大妈上前询问玛卡丽是做什么的。而玛卡丽仿佛对

<sup>①</sup> 基督教民主党是智利执政联盟第一大党，成立于一九五七年七月，主张实现真正的基督教义，建立民主制度，与不同的思想派别共处。

这个问题早有准备，马上回答说自己是英语老师。

那时天色已晚，大人们招呼我去睡觉。我只得毫不情愿地在帐篷里为自己腾出块地方。我害怕睡着，正好，静夜里听听这些空虚的交谈给我带来了点儿乐趣。他们提到了玛卡丽和珂罗蒂雅，我听出劳尔曾想抛弃她们。有人说那小女孩儿有些古怪。我没这感觉，相反倒觉得她挺漂亮。至于玛卡丽，按照我母亲的说法，“一点也不像个英语老师。”——“她就一张主妇脸！”一个邻居接过话头，随后众人乐了好一阵。

我琢磨着“英语老师的脸”，一张英语老师的脸该是什么样呢？我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他们又有着怎样的脸呢？我们的父辈从未真真正正地展示过自己的面貌；我们也从未学会正视他们的容颜。

我以为我们会露宿几周甚至数月，眼巴巴地盼着大老远处能来辆卡车送来食物和毛毯。我甚至想象自己上了电视，感谢全体智利人民的帮助，就像风暴来临时那样——我想起了早几年那些可怕的风暴，大家没法出门，几乎是别无选择地守着电视屏幕，观看那些已经一无所有的人们。

但事实并非如此。平静的日子迅速回归。在圣地亚哥以西这个偏远的角落，地震无非一场虚惊。教堂塌了几堵矮墙，但没有任何重大损失或伤亡。电视上播放着一片狼藉的圣安东尼奥港口和其他几条我见过、或我以为我在为